

秦并巴蜀战略下秦惠文王的安全思想探析

李昊轩

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乌鲁木齐, 830046

摘要: 秦惠文王时期秦国兼并巴蜀的战略抉择, 不仅是该时期秦国地缘战略的重要实践, 还是该时期秦惠文王安全思想的重要体现。在巴蜀相攻的历史契机下, 秦惠文王历经朝堂论战, 摒弃东出攻韩的短期谋略, 择取伐蜀拓土的长期布局, 实现了秦国首次大规模领土扩张, 为其后续统一中国奠定了关键基础。在探析秦国兼并巴蜀的战略过程中发现其中蕴含着秦惠文王规避风险、以兵谋利、力求合理的三大思想, 这三大思想既是秦国对前期富国强兵成果的战略运用, 也是其在秦国国力未达绝对优势时, 对于统筹维系安全、谋求发展二者关系的智慧体现。

关键词: 秦并巴蜀; 战国战略; 中国古代安全思想

An Analysis of King Huiwen of Qin's Security Thought under the Strategy of Qin's Annexation of Ba and Shu

Li Haoxuan

School of Political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830046,
China

Received: April 17, 2026

Revised: May 19, 2026

Accepted: May 22, 2026

Published: May 25, 2026

Copyright: © 2026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Axon Academic

Publishing Institute, Hong Kong,

China. This article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CC BY)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Abstract: The strategic decision of the Qin state to annex Ba and Shu during the reign of King Huiwen was not only a significant practice of Qin's geopolitical strategy at the time but also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King Huiwen's security thought. Seizing the historical opportunity when Ba and Shu were attacking each other, King Huiwen, after a series of court debates, rejected the short-term strategy of eastward expansion to attack Han and chose the long-term plan of conquering Shu to expand territory. This decision led to Qin's first large-scale territorial expansion, laying a crucial foundation for its subsequent unification of China. An analysis of Qin's strategic process of annexing Ba and Shu reveals three key ideas in King Huiwen's thought: risk avoidance, seeking profit through military means, and striving for legitimacy. These three ideas not only

represent Qin's strategic application of its earlier achievements in enriching the state and strengthening the military but also reflect King Huiwen's wisdom in balanc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intaining security and pursuing development when Qin's national power had not yet achieved absolute superiority.

Keywords: Qin's annexation of Ba and Shu; Warring States strategy; ancient Chinese security thought

公元前 316 年，蜀王因其弟苴侯暗中同巴国结好而勃然大怒，随即起兵攻苴。苴侯兵败后逃往巴国求援，以致巴蜀相攻。巴蜀两国遂告急于秦，希望秦国予以援助。经过秦国朝堂论战及秦惠文王对秦国战略环境和国力的综合考量后，惠文王命司马错、张仪、都慰墨等率军从石牛道伐蜀，秦军在葭萌大败蜀兵，蜀王败逃至武阳为秦军所杀，蜀灭。随后，司马错又乘机率军灭巴、苴两国。至此，秦国兼并巴蜀之地，完成了对巴蜀之地的占有。秦并巴蜀是秦首次实现大规模的领土扩张，为秦国后来统一中国事业的成功奠定了最初的基础^[1]。

安全思想一方面源于实践，受制于现实基础，另一方面又可在实践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和印证。因此，本文将以秦国兼并巴蜀的战略抉择为研究样本，通过分析《战国策》、《史记·张仪列传》等历史资料中有关秦并巴蜀的相关记载，结合秦国兼并巴蜀两地的发展脉络，进一步研究在该事件中秦国的战略实践选择，以期探析秦惠文王时期秦国战略实践中所蕴含的秦惠文王的安全思想。总体而言，秦国兼并巴蜀之地的战略实践中蕴含着秦惠文王以秦国国力与秦国战略目标为现实基础而产生的韬光养晦、规避风险；以兵谋利、积聚国力；师出有名、力求合理的三大安全思想。

1. 规避风险、韬光养晦

秦国孝公时期，历经商鞅二十年变法改革，一方面使得秦国的动员能力、农业水平得到极大提升；另一方面，变法后秦国的军事实力提升使其历经元里之战、安邑之战以及河西决战后，彻底击败世仇魏国，以收复河西之地，占据黄河天险为终，实现了秦国在身份上由弱国向强国的转变。

秦惠文王初期，秦国“方千里者五”^[2]，有关中、河西、上郡、陇西、北地，学界估算其人口规模约为 400 万；楚国“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3]；齐国“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3]，

人口规模约为 300 万—400 万。七国土地楚最大，秦次之，齐又次之^[4]。人口楚最多，秦次之，齐又次之。

可见，在秦惠文王时期，即便秦国在动员能力、战争潜力方面相对于关东六国具有一定的优势，甚至在公元前 318 年面对公孙衍率领五国联军合纵攻秦时仍能取得胜利，但秦国在人口、土地等方面相较于齐国、楚国则差距相对较小。秦国无法以一国之力长期持续对抗关东六国。换言之，当时秦国的综合国力只允许使其成为地方性区域强国，而并不能使其成为类似于秦昭襄王时期在综合国力方面对于其他六国都具有极大优势的超级强国。

因此，基于秦国自身国力积累不足以支撑其快速实现称霸目标以及秦国国力对比同其他关东强国差距较小的现实条件，所以即便在“东出函谷、争霸中原”已经成为自秦孝公以来秦国历代君主的宏伟目标下，但在实践层面，秦惠文王仍未采纳张仪提出的攻韩东出的战略构想。

秦惠文王认为此时攻韩东出风险较大，必然会触动关东六国的核心利益，容易招致六国的忌惮和联手抵抗，使得秦国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这不仅可能葬送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积累的发展成果，甚至还有可能会动摇秦国的安全根基。此外，在六国看来，巴蜀地属偏僻，远离中原政治中心，并非处于各国围绕争霸目标而进行战略竞争的核心地带，所以即便秦国将巴蜀尽收囊中，也不会直接威胁到关东六国的切身利益，更难以引发六国的联合抵触与干预。因此，相较于东出函谷攻韩，兼并巴蜀的战略风险则大幅降低。

秦惠文王择取伐蜀之策，正是利用了巴蜀的地缘区位特点，试图通过以最小的外部风险换取国家版图的扩张和实力的积累。这彰显了秦惠文王对战略风险的精准把控与立足国力基础的战略智慧，更体现了其在战略抉择中蕴含的规避风险、韬光养晦更加偏向保守和务实的安全思想。

2. 以兵谋利、积聚国力

面对秦惠文王欲出兵吞蜀又恐韩国来犯的犹豫和顾虑，秦廷在是否用兵层面上的意见形成了高度的统一，即应当用兵。但在用兵方向上，即在吞蜀伐韩的战略选择上则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用兵的统一折射出在列国纷争的战国时期，军事手段作为维护安全、为国取利甚至建构霸权的终极工具已经成为各国谋略家的共识，秦国自然也不例外。而方向的分歧实质上一方面体现了张仪、司马错对于秦国国力和蜀地认知上的差异，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二者对军事手段所服务的对象在观念上的差异。

在秦廷的论战中，张仪提出秦国应当“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辕、缙氏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5]”。使“周自知不救”而献出九鼎。随即通过“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来达成秦国称霸天下的战略目标，即秦国应当将视野置于“天下”，而非要将目光聚焦于巴蜀这一贫瘠之地。

然而，司马错反驳道：“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愿先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5]。”

张仪是在其对中原各国的形势充分了解的前提下，试图通过军事手段征服韩国、威压周室，以便在旧的政治框架下谋求短期的霸权以实现秦国称霸的战略目标。但他忽略了一基本的事实，这就是尽管当时秦已比较强，但还未形成独强局面^[6]。张仪的战略构想看似合理，但事实上，在“礼崩乐坏，实力至上”的战国时期，旧政治框架下形成的霸权抑或是安全状态一旦缺乏强大的国力支撑，则霸权或安全状态便难以维系。

司马错对中原各国的情况并不是不了解。但他是秦国人，对秦国的实力了解得则更加充分。他认为制定战略方针必须估量自己的实力。不仅要考虑外交与军事的因素，还要考虑政治和经济因素^[7]。因此，司马错认为秦国此时的核心矛盾，并非“称霸中原”，而是“地小民贫”，唯有先解决这一矛盾，才能为后续的争霸天下奠定基础。司马错的战略是将军事手段作为服务国家长远发展的工具，通过兼并巴蜀实现领土扩张与资源积累，进而达到“广地、富民、缮兵”的目标，以长期的实力筑基，替代一时的霸权虚名，最终为维护秦国安全甚至争霸天下而铺平道路。

最终，秦惠文王在以战争服务称霸与以战争服务富国两条路径中采纳了司马错的提议。这一方面体现了秦惠文王对于军事手段服务对象的认识，即军事手段并非追求短期的霸权虚名的工具，而是通过战争拓土，通过拓土提升国力进而为国家实现其长期战略目标而进行资本积累的手段。另一方面则映射出秦惠文王希望通过稳扎稳打的方式实现富国强兵，再通过兵强国富维护安全、服务战略目标为核心的思想。在秦国兼并巴蜀之后，秦国的领土面积大幅拓展，人口与粮食储备显著增加，战略资源得到极大补充，国家的战争潜力与综合国力实现了巨大的提升，为后续秦武王、秦昭襄王的东出争霸

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也正是秦惠文王以兵谋利、积聚国力思想指导下的成果体现。

3. 师出有名，力求合理

在伐蜀与攻韩的战略抉择中，用兵的合理性是秦惠文王考量的另一关键因素。即便征伐扩张已经成为战国时期各国实现称霸目标和维护安全状态的共识，但各国仍同样重视用兵合理性的构建，即追求师出有名。对于构建用兵合理性的关键内核在于如何建构出兵的理由，使得出兵具有合理性以至于在一国用兵过程中得到大部分国家的支持或默许。

司马错在反驳张仪时便一针见血地指出攻韩劫天子的致命缺陷：“今攻韩劫天子，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周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则必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不能禁^[5]。”

在出兵伐蜀的层面上，秦国是具有自然的出兵合理性基础的。这是由于秦国出兵伐蜀是建构在巴国受蜀国攻击而向秦国求援的前提之上的。因此，即便秦国不去主动建构出兵伐蜀的理由，巴国在受到蜀国进攻后向秦国求援的事实也为秦国出兵伐蜀提供了极具正当性、合理性的理由。此外，在关东六国看来，秦国出兵是应巴国之请，以解决西南边陲的区域纷争为目标的调和行为，而并非以争霸为目标而针对中原各国的战略扩张行为，因此六国自然无需加以干预。这种天然的合理性，让秦国的伐蜀行动避开了“不义”的道德陷阱，减少了外部的外交阻力与军事干预，保障了对蜀用兵的顺利推进。

反观出兵攻韩，秦国则不具有自然的出兵合理性基础。因此，秦国则需要主动建构出兵伐韩的理由。一方面，韩国既是和秦国相同的诸侯国，又是中原政治中心地带，各国必将重视韩国这一地域。因此，即便秦国建构了攻韩的正当理由，但仍有可能因触及其他五国的利益而招致对抗。在秦昭襄王时期秦赵两国因上党之争而引发的长平之战就是对此最有力的佐证。另一方面，秦国并无周主之罪的事实佐证，而仅凭言语建构的用兵理由不仅难以建构出兵合理性的基础，反而还可能因欲盖弥彰式的说辞使秦国陷入“不义”的陷阱。

秦惠文王择取伐蜀之策，正是充分考量了用兵合理性的重要性。他深知，在国力未达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任何缺乏合理性的军事行动，都可能引发连锁的外交与军事风险。这不仅不能实现秦国的战略目标，甚至还可能动摇秦

国的安全根基。而依托巴蜀求援的事实建构出兵合理性，既让秦国的军事行动师出有名，又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外部风险，保障了兼并巴蜀战略的顺利实施。

秦惠文王以韬光养晦的方式规避了秦国过早东出将要面临的六国忌惮与联合抵抗的战略风险，一定程度上维系了秦国相对安稳的发展环境，又以军事扩张的手段实现了领土、资源与人口的积累，提升了秦国的综合国力，逐步拉大了楚国、齐国与其他的国力差距，为秦国实现其战略目标奠定了实力基础，更以追求建构用兵合理性的方法降低了秦国在使用军事手段谋取国家积累的过程中所受到的阻碍。可以说秦惠文王规避风险、韬光养晦；以兵谋利、积聚国力；师出有名、力求合理的三大思想既是自秦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富国强兵思想的延续，又是在秦国由区域性强国到战国第一强国转化过程中秦国对于发展和安全两者关系的思考，更是中国古代战略思想、安全思想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 [1] 王子今. 秦兼并蜀地的意义与蜀人对秦文化的认同[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8(2).
 - [2] 商鞅. 商君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 [3] 刘向, 集录. 战国策[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 [4] 范文澜, 蔡美彪, 等. 中国通史: 第1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 [5] 司马迁. 史记·张仪列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6] 赵泽光. 评秦惠文王灭蜀[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3).
 - [7] 徐敏. 论秦统一中国的战略[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1989(3).
-